

第三章 合浦南越国遗存辨识

本章根据对南越国遗存以及关于合浦汉代遗存的既往研究，希望辨识出一批南越国时期遗存，以期作为南越国政权治下合浦地区整体社会面貌研究的考古学基础材料。

第一节 合浦汉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合浦的考古发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自 80 年代起，随着大量城市基础建设的开展，抢救性发掘的遗存也逐渐增多，主要为汉代墓葬和城址。据统计，迄今合浦已发掘墓葬 1200 余座，其中以汉墓居多，也有少量为三国墓、晋墓和南朝墓。相关的汉代城址，发现了大浪古城和草鞋村遗址两处。

一、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一) 历年发掘概况

1957 年 4 月，广东考古工作者（当时合浦属广东省辖）在杨家岭和廉东钟屋各清理砖室墓 1 座。两墓形制相似，均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其中杨家岭墓出土陶罐、陶壶、银戒指和铁匕首；钟屋墓出土陶盂、陶屋、棺钉、五铢和半两铜钱等^[1]。

1971 年 10 月，考古工作者在位于县城东南郊望牛岭的县炮竹厂发掘 1 座木椁墓，该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其中甬道两侧带耳室。随葬器物共 245 件，以铜器居多，还有陶器、铁器、漆器、玉石器、琉璃器和金器等。从墓中出土的铜凤灯、金饼、珠饰品等珍贵器物以及有“九真府”墨迹的陶提筒等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西汉晚期位于现越南境内的九真郡高级官员^[2]。

1972 年 3 月，在廉州炮竹厂第一仓库发掘 1 座砖室墓，该墓由墓道、前室、中室和后室四个部分组成，前室为横券顶，中室为穹窿顶，后室为直券顶，中室两边还有侧室。出土一批陶器和铜器，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3]。

1975 年秋，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训练班学员在环城公社堂排至蛹口间发掘 4 座西汉晚期墓，均是带墓道的竖穴木椁墓，其中 M2 为夫妻异穴合葬墓。这批墓葬随葬有大批兵器和农具，墓内发现保存完好的稻谷和荔枝果壳、果核，还出土“胡人”俑和琉璃、玛瑙、琥珀等^[4]。

1984 年 9 月，广西自治区博物馆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城南凸鬼岭清理 2 座夫妻异穴合葬墓，年代为西汉晚期，为研究西汉时期合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5]。

1985 年 3~4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廉州炮竹厂发掘 1 座西汉晚期木椁墓。该墓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椁室封护考究，四周填以白膏泥。墓道底端有外藏椁，内置铁斧 1 件。主要随葬陶器和铜器^[6]。

1985 年 5~7 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望牛岭和风门岭共发掘墓葬 13 座，出土器物 300

余件。其中风门岭发掘土坑墓3座，砖室墓5座；望牛岭发掘土坑墓4座，砖室墓1座。土坑墓中4座为同茔异穴合葬墓，随葬器物丰富，以陶、铜器为主，另有滑石器和铁器。砖室墓多被盗扰，所剩器物不多^[7]。

1986年4月，合浦县博物馆在丰门岭（即“风门岭”）第二麻纺厂发掘古墓10多座，其中M10保存较完整。M10为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四部分组成，其中前室为穹窿顶，两后室为直券顶。东后室置陶器和铜器，西后室安放棺木。该墓出土的金银器、珠饰品和成套的葬玉制作精美。墓葬年代，报告定为东汉早期^[8]。但也有学者认为应晚至东汉晚期^[9]。

1987年3月至1988年5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县城东南的文昌塔发掘古墓227座，年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有土坑墓和砖室墓两大类，其中竖穴土坑墓数量居多，有无墓道和带墓道两种；砖室墓多被盗扰。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和铜器，还有少量铁器、玉石器、珠饰品等^[10]。

1991年7~8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县城南母猪岭发掘6座东汉时期砖室墓，墓葬可辨出早晚两期。其中M6为砖圹墓，余为直券顶墓。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金银器、石器和珠饰品。发掘报告认为M1和M6应属东汉早期，其余属东汉晚期^[11]。

1990年至1996年，合浦县博物馆在母猪岭先后抢救性发掘墓葬10座，报告发表其中5座，包括西汉晚期木椁墓3座、东汉晚期砖圹墓和直券顶砖室墓各1座。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铁器、珠饰品和银器也有少量发现^[12]。

1995年5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车站盘子岭发掘砖室墓38座，其中1座为合葬墓，年代分属东汉早、晚两期。直券顶墓居多，余为砖木合构墓、穹窿顶合券顶墓和双穹窿顶墓。盗扰严重，所剩随葬品很少^[13]。

1996年12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禁山七星岭发掘砖室墓11座，破坏较严重。除1座为无墓道的单室墓外，其余为带斜坡墓道的直券顶墓或穹窿顶合券顶墓。出土陶器、铜器、滑石器和铁器等，年代为东汉晚期^[14]。

1999年4~5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凸鬼岭发掘汉墓17座，有土坑墓、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三类。随葬器物以陶器居多，其中M6和M11出土较多滑石器。墓葬年代分属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15]。

2001年7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九只岭发掘墓葬6座，其中5座为东汉墓。分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两类，出土器物以陶器和铜器为主，还有金花球、琉璃珠、琥珀珠、玛瑙珠等饰品。这次发掘填补了合浦汉墓一些形制上的空白，更为建立可靠的东汉前、后两期断代标尺提供了材料^[16]。

2003年11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罗屋村发掘砖室墓6座，该墓地盗扰严重，随葬品多已无存。报告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部分也可能晚至三国时期^[17]。

2003年底至2005年初,广西文物工作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风门岭发掘汉墓8座。包括木椁墓和砖室墓。出土陶器、铜器、滑石器、金银器、铁器、珠饰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年代跨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四期^[18]。

2005年8~9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在文昌塔发掘汉墓8座,其中6座为西汉晚期,余2座分属东汉早、晚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较以往的发现更具地域特点,为该墓区分期以及了解合浦汉墓的区域特征均提供了重要资料^[19]。

2005~2009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在禁山、风门岭、炮竹厂、凸鬼岭、杨家山等地陆续开展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古墓56座,年代从西汉晚期延至南朝,其中以汉墓居多。汉墓有木椁墓、砖木合构墓、砖室墓三类,砖室墓又分直券顶、横直券顶、穹窿顶、穹窿顶合券顶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铁器、银器、玉石器及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珠饰^[20]。

2008~2009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还在寮尾墓地发掘古墓32座,其中东汉晚期墓7座,三国墓25座。汉墓有砖圹墓和砖室墓两类,砖室墓有直券顶墓、横直券顶合穹窿顶墓和横直券顶墓三种。出土的青绿釉陶壶、铜钹、胡人俑、焊珠金饰片、钠钙玻璃、蚀刻玛瑙珠等较多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器物。本次发掘为东汉晚期墓葬向三国墓的分期演变、年代发展序列提供了清晰的分期标准^[21]。

2009~2013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在杨家山、禁山官塘岭、汽齿厂、第二炮竹厂、廉州乳品厂、精神病院、电厂、迎宾大道、罗屋村、沿海铁路合浦段、中站李屋村、森林公园、南方机械厂、中站庞屋队、火车站等15处地点陆续发掘古墓157座,年代跨西汉晚期至晋代。其中汉墓62座,有土坑墓、木椁墓和砖室墓三类,主要为砖室墓^[22]。

2012年6~9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大浪古城北面编号D2的土墩墓进行发掘。D2为一墩多墓结构,内发现3座长方形熟土坑墓。随葬器物有陶甗、杯、瓮,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2003年试掘的D1,亦应为土墩墓。从器物判断,年代略晚至西汉中期^[23]。

除以上发表报告外,合浦县还馆藏有1977-1995年间抢救性发掘的95汉墓资料。此外,广西自治区博物馆也保存有部分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的墓葬资料。

(二) 既往研究简述

近年来,随着合浦汉墓发掘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升温,学者们对合浦汉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基础性研究

主要为历年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涉及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的类型划分以及墓葬年代的分期研究。广西汉墓的分期划分标准多参照广州汉墓,因上世纪50~60年代发掘的广州汉墓,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丰富、主要器物的演变规律清晰、年代序列完整,可清晰地分

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期五期^[24]。依此划分标准，合浦现已建立起相对清晰的分期标准，为与中原及岭北其他地区统一起见，可分为秦代和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东汉早期和东汉晚中期等五期^[25]。

2. 出土器物研究

合浦汉墓出土器物以陶器居多，铜器次之，其次为铁器、金银器、玉石器和各类珠饰品等。有关陶器的研究主要是鼎、盒、壶、仿铜陶礼器和井仓灶屋等模型明器，将其置于广西乃至岭南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研究，如朱海仁收集广州、番禺、徐闻、韶关、贵港、合浦、梧州及桂北等地汉墓出土的仿铜陶礼器，考察其发生演变过程，其指出仿铜陶礼器在岭南西汉早期繁盛，西汉中后期、东汉前期开始弱化演变，到东汉晚期已全面淡化。这一过程是中原礼制文化在岭南的推行历史，从侧面反映了周秦礼制的逐步淡化和大一统汉文化的逐步形成^[26]。李世佳运用类型学对广西汉墓出土的陶井进行型式分析，并与中原以及相邻的广东、湖南两地所出同期器物进行对比研究，论证得出广西汉代陶井形制和纹饰均颇具岭南特色，与广东汉代陶井更有相似^[27]。曹劲对岭南地区考古发现的建筑遗迹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初步建立了史前至两汉期间岭南早期建筑起源和发展的框架^[28]。冯远博士论文对岭南地区陶制建筑明器进行系统梳理，理清该地区建筑明器的发展规律和阶段特点，与邻近地区对比，并讨论其结构特点和建筑布局的演变，以期复原岭南地区汉代建筑^[29]。

出土的铜器也有一些专门研究，如蒋廷瑜对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种类、制作工艺、时代和制作中心进行分析论述，选取的器物多出自合浦，文章指出该类铜器繁盛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在岭南地区出现较早，流行时间长，数量、种类多，广西的合浦、贵港、梧州三地，应是其制作中心和主要产地，拥有者应为当时的官僚贵族^[30]。熊昭明对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仓灶组合进行研究，通过与北方地区同期出现的同类器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合浦所出该类器物是仿自当地的陶器，为本地制作，推测为临时“订制”。梧州等地发现的该类器物很可能从合浦输入的。出土铜井仓灶的墓葬，墓主身份地位较高，体现了汉代厚葬之风^[31]。富霞收集合浦历年出土的汉代铜器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初步分析各类器物演变规律，并将合浦出土铜器同海南、徐闻、越南北部等北部湾其他地区同类器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其地域特点和发展特征。从器型、风格和制作技术来看，合浦汉墓出土铜器应多是本地铸造^[32]。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如玻璃、石榴子石、琥珀、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珠、水晶、绿柱石、黄金等饰品以及波斯陶壶、铜钹和胡人俑座灯等，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尤其是玻璃器。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安家瑶、史美光、黄启善、干福熹、王俊新、李青会、王伟昭^[33]等学者的研究均涉及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器，包括探讨其形制、成分特征和来源等。2010 年，熊昭明和李青会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器开展考古学和科技综合研究，其中大部

分器物来自合浦。通过与周边地区、东南亚、南亚及地中海地区出土的同期玻璃器进行比较,分析其制作技术和源流。研究表明,合浦出土的玻璃器主要为本地自制,还有部分来自东南亚、印度和罗马等地,初步厘清了合浦出土玻璃器的源流^[34]。

陈洪波对南海沿岸汉墓出土的金花球等饰品进行制作工艺、年代及来源研究,认为合浦金珠饰品体现出域外风格,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也有在合浦当地制作的可能性^[35]。黄珊等运用考古类型学和科技分析对寮尾 M13B 出土的青绿釉陶壶进行综合研究,指出这件器物应是来自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西南部地区的舶来品,作为随身日常用品通过海路来到合浦,其主人有可能来自西亚^[36]。熊昭明对寮尾 M13B 出土的乐器铜钹的定名、纹饰和来源作了探讨,指出该器物具有强烈的中亚文化色彩,极有可能是从安息一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合浦的^[37];他还对合浦汉墓出土的舶来珠饰品做了系统研究^[38]。

其他器物如灯具、玉器等也有文章论述涉及。如熊昭明中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灯具进行分类研究,合浦是广西灯具的主要出土地之一,是在中原汉文化、楚文化等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在接受内地传人的同时,岭南越人又创造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灯具文化^[39]。熊昭明、谢日万对广西出土的先秦两汉玉器进行系统研究,其中涉及合浦望牛岭、堂排、风门岭、黄泥岗等地出土的玉璧、带钩、玉碗以及一些葬玉类器物。文章指出广西出土的汉代玉器原料应为外地输入,其形制受中原文化影响最大,其次为楚或广东、云南等地^[40]。

堂排出土的“劳邑执封”琥珀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黄展岳认为“劳邑执封”琥珀印与海南岛乐东出土的“朱庐执封”银印与南越国后期自铸官印基本相符,推测两印或是南越国用楚官执封名号赐封人居南越的楚国后人^[41]。郑君雷对海南“朱庐执封”银印和合浦堂排 M1 出土的“劳邑执封”琥珀印的年代和性质作了分析,指出合浦堂排出土的“劳邑执封”琥珀印墓主当是南越国封拜的越人部族首领,入汉后仍为地方豪强。文章同时还对望牛岭 M1 的墓主身份做了推测,从出土的“庸母印”琥珀印判断,其墓主身份除九真郡太守外,还有流徙罪人之可能,“庸母印”或应读为“毋庸印”,墓主或为西汉晚期流徙合浦的毋庸家族人仕^[42]。

二、埋葬习俗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合浦丰富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成为研究丧葬习俗的重要材料,相关论著主要涉及合葬墓、厚葬、外藏椁及架棺葬、碎物葬等内容。

汉代是夫妻合葬墓的重要发展和转型时期,合浦两汉时期墓葬均有发现。蒋廷瑜指出岭南地区的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出现于西汉早期,中期开始流行,盛行于晚期。合葬墓的使用,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长期采用木椁相关,是同坟同穴合葬墓的变体或旁枝,虽是一种带地域性的葬式,但并没有形成本地的特殊葬俗,不能把它作为特有的民族习俗来看待。岭南地区自东汉前期起盛行小砖券墓,由于砖比木材坚固耐久,同穴合葬一般不成问

题，同坟异穴合葬就自然地消失了^[43]。

林强将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分为同坟异穴和同坟同穴两个类型，认为其演变发展是同时的，但东汉时期同坟异穴合葬墓已明显减少，还认为岭南地区的合葬墓具有本地特点，在形制和发展演变方面与中原地区有较明显的差异^[44]；他还探析了广西汉代厚葬习俗，指出西汉时期有大型棺槨墓和中型墓两种厚葬方式，为上层统治阶级、贵族所采用，东汉时期多为中型砖室墓，随葬品明显减少。林强认为厚葬习俗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精神信仰、儒家思想和经济发展三个因素^[45]。

另外，合浦一些大中型墓葬的墓道底端或一侧带有外藏椁，谢广维对广西汉墓“外藏椁”的发展演变及所反映出的墓主身份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广西外藏椁最早见于西汉早期，至西汉中晚期，“外藏椁”以耳室及墓道底部陪葬坑的形式基本固定下来；东汉初期走向衰弱，之后消亡。使用这一制度者多为诸侯王、列侯及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吏^[46]。熊昭明等人指出广西汉墓的外藏椁形制发展到西汉中晚期，有回廊式、耳室形和墓道底部椁坑形三种，后两种在合浦汉墓中有不少发现，东汉时期消失。这类墓葬的主人应为郡守一级的官吏或贵族阶层，其身份可能为南下的汉人^[47]。

也有学者注意到合浦汉墓的一些其他葬俗。岭南汉墓中开口常见的柱洞，郑君雷按性质和功用划分为“封门排柱”、“椁盖顶柱”、“椁板壁柱”、“棺架立柱”、“甬道门柱”、“棺椁围柱”和“墓上表木和墓上建筑”等七类，认为文昌塔 M6 和 M8 在墓道底端近墓室处的柱洞，应为甬道门柱；而文昌塔 M5 和罗屋村 M3 墓口的柱洞，似与筑墓时搭建的临时建筑有关^[48]。其对岭南战国秦汉的架棺葬俗还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合浦母猪岭 M4 为架棺，上层为棺室，下层为器物室^[49]。此外，合浦汉墓还发现碎物葬，其中近年来发现的汽齿厂 M9 和 M11 随葬器物破碎严重，部分器物的残块分置几处，且相距较远，应为入葬时有意打破后放置；二炮厂 M4 出土 1 面铜镜，仅见一小段外缘。富霞认为，这类墓主为汉化越人的可能性较大^[50]。

三、其他相关研究

一些学者从汉墓资料出发，试图对合浦乃至岭南的秦汉时期经济、文化、社会、商贸等作初步复原。彭长林^[51]、邓家倍^[52]、王元林^[53]、覃主元^[54]、熊昭明^[55]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汉代合浦港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富霞、熊昭明从合浦发现的土墩墓，结合江浙、福建、广东、湖南和越南北部的发现，论述文献记载中从先秦时期开始、沿东南沿海的“越人南迁”路线的真实存在，说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北部湾地区与东南沿海通过海路的密切联系已经存在^[56]；蒋廷瑜就考古发现的铁质农具、种子、农副产品以及与相关的陶仓模型等，对包括合浦在内的汉代广西农业概况作了概括^[57]；洗剑民以岭南为背景，论述了农业、青铜业和冶铁业、商业萌芽等内容^[58]，吕名中亦对岭南的经济发展及特色做

了探讨^[59]。

四、城址的发掘与研究

两处城址均为近年发掘，由于城内民居较多和历年破坏，且发掘面积有限，城内布局不甚明了，仅对城址的年代和性质进行初步判断。

（一）大浪汉城址

大浪汉城址位于合浦县城东北约 11 千米的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该城址发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城墙上方有明代墓葬叠压，1981 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年代被暂定为“明以前”。此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会同合浦县博物馆成立汉代合浦港课题组，对大浪古城进行调查。2002 年 9 月~2003 年 4 月和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 月，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课题组对城址进行测绘和勘探，并先后两次进行发掘，发掘位置分别位于北城墙、城中央及西门外，发掘面积共约 690 平方米，发现居址和码头遗迹等。出土遗物主要为几何印纹硬陶片，可辨器形有陶罐、匜、釜等，还有少量砺石。判断城址筑造年代不早于西汉中期，性质为西汉中期始设合浦县的治所^[60]。

（二）草鞋村汉城址

草鞋村汉城址位于合浦县城廉州镇草鞋村西面，上世纪 80 年代调查时发现马蹄窑和馒头窑若干，被界定为“窑址”，并于 1993 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 年 11 月~2012 年 1 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等单位对位于遗址西北部的窑址位置开展发掘；2010 年 5~6 月，为配合基建抢救性清理遗址北部的建筑遗迹。该遗址地层共分为七层，其中汉代遗存分为四期，对应年代分别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东汉早期及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发现遗迹主要为灰坑、圜泥坑、沟、池、房址、水井、磔墩和柱洞等。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陶器多为建筑材料，主要有筒瓦、板瓦残片、瓦当、砖、算等；生活用具有罐、双系罐、四系罐、案、钵、碗、盆、釜、灯和支座等；生产工具有拍、垫饼、网坠、纺轮等。金属器见铜镞、铜箭镞、铁矛和铁钉，石器有石拍、砺石、石饼、石杵臼、石斧、滑石暖炉、滑石釜和滑石碗。另外还出土木拍、象骨、水晶和铜钱等。报告认为草鞋村遗址应是东汉合浦郡的郡城，且有可能在早一阶段的西汉晚期，已作为郡治^[61]。

-
- [1] 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墓》，《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附录一，科学出版社，2006年。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凸鬼岭清理两座汉墓》，《考古》1986年第9期。
- [6] 蓝日勇：《合浦县廉州炮竹广西汉晚期墓》，《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0页。
- [7] 黄启善：《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0~191页。
- [8] 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0]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年。
- [11] 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 [12] 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岭东汉墓葬》，《考古》2004年第4期。
-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县凸鬼岭汉墓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罗屋村墓葬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9]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2005年合浦县文昌塔汉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 [20]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 [21]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至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 [2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 [2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2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八章第十一节《岭南地区汉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2~491页。
- [26] 朱海仁：《岭南汉墓出土仿铜陶礼器的考察》，《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年。
- [27] 李世佳：《广西汉墓出土陶井明器初探》，《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 [28] 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9] 冯远：《汉代岭南地区建筑明器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 [30] 蒋廷瑜：《汉代镌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8期。
- [31] 熊昭明：《合浦汉墓出土的铜井仓灶》，《瓯骆汉风：广西古代陶制明器》，香港历史博物馆，2014年。
- [32] 富霞：《广西合浦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研究》，《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3] 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考古》1988年第3期；黄启善：《广西发现汉代的玻

- 璃器》，《文物》1992年第4期；干福熹：《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玻璃》，《自然杂志》2006年28卷5；王俊新，李平，张巽等：《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核技术》，1994年第8期；王伟昭，熊昭明，李青会，干福熹：《广西合浦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检测和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 [34]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
- [35] 陈洪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土金珠饰品的考古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36] 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
- [37] 熊昭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钹略考》，《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
- [38] Xiong Zhaoming. The Hepu Han Tomb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Han Dynasty. *Antiquity*, VOLUME:88, 342, P1240;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年。
- [39] 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 [40] 熊昭明，谢日万：《广西出土的先秦两汉玉器》，《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 [41] 黄展岳：《“朱庐执刂”印与“劳邑执刂”印——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
- [42]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历史博物馆，2014年。
- [43] 蒋廷瑜：《汉代同坟异穴夫妻合葬墓浅议》，《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44] 林强：《岭南汉代夫妻合葬墓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 [45] 林强：《广西汉代厚葬习俗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 [46] 谢广维：《广西汉代“外藏椁”初探》，《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 [47] 熊昭明、谢广维：《广西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外藏椁》，《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燕山出版社，2009年。
- [48]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 [49]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50] 富霞：《合浦汉墓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 [51] 彭长林：《试论汉代合浦港的兴衰与海外贸易的关系》，《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 [52] 邓家倍：《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5期；《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
- [53] 王元林：《两汉合浦、徐闻与南海丝路的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 [54] 覃主元：《汉代合浦港在南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 [55]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的新进展》，《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博物馆，2014年。
- [56]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 [57]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 [58] 冼剑民：《秦汉时期的岭南农业》，《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汉代岭南的青铜业和冶铁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汉代岭南的商业萌芽》，《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
- [59] 昌平中：《秦汉时期的岭南经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 [60]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大浪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8期；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考古学实践与初步认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61]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

